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样本”的积极意义

□ 徐杰舜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总书记对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广西各族人民。当前,在广西努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背景下,很有必要进一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评价。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显著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成为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

众所周知,广西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是革命老区、边境地区,是中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在加强民族团结进步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西的常住人口为5012.6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880.80万人。广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没有发生过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走在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甚至全国前列。所以,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什么是广西?在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积极意义何在?

一、中西方关于民族问题的治理是有差异的

了解中国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广西样本”对世界解决民族问题的启示,从中西方关于民族问题治理的差异切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视角。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治理成了世界政治家绕不过的大难题。普京就讲民族问题是俄罗斯“国家的根本问题”。

政治家都明白民族问题的治理,与民族和国家的建构有密切的关系,就现代国家的建构而言,中西方有巨大的差异,如西欧走的是民族与国家同构的多元道路,形成了基本上民族同质的西欧国家;美、加、澳三国则走的是移民与国家同构的征服道路。而中国从传统的“夷夏之辨”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区域自治”,才找到解决中国民族治理问题的正确方法,走的是从民族多元走向国家一体的和合道路。

不同的道路所形成的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必然产生差异。那么,中西方关于民族问题治理的差异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民族政策,一国一族,欧洲基本如此;另一种是“马赛克”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概括地说是“一国多元”,如北美和澳洲基本如此。中国民族问题治理思想和政策是“大家庭”式的“多元一体”,准确地说是“从多元走向一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

这是我们认识“广西样本”对世界解决民族问题启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

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时,最终选择了“合”的方案

要进一步思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什么是广西,有必要回顾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的历史。当时,曾基于少数民族人口、地域经济特点等因素形成了“分”“合”两种方案。“分”“合”方案的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最终选择“合”的方案?

1956年开始筹建时,“合”的方案就是把广西全省改为壮族自治区;“分”的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广西省东部的桂林、平乐、容县三个专区和梧州、桂林两市;另在广西省西部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管辖区域大体包括宜山、百色、邕宁三个专区和南宁、柳州两市。

“分”“合”方案的差异就是基本上把汉族与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区隔开了。而最终选择“合”的方案,不仅是历史的使然,体现了中央方针和广西实际的结合、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更是凝聚了广西各族人民的智慧,是广西治理民族问题一个大手笔,完全顺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大趋势。

但是,“合”的方案后来也遇到了挑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发生过在经济发展上是“先东后西”还是“先西后东”的争论,但很快被改革开放的浪潮冲破了东西部的区分。二十一世纪初期西方妄图推行强化壮族“独立意识”的战略,来分化广西的民族团结进步,给我们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在广西各民族“安如磐石”的“一家亲”面前很快被粉碎了。

三、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样本”的核心经验

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体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那么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样本”的核心经验是什么呢?

2021年我在《广西民族报》上,以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经验的理论分析为例,发表了《磨合论》《包容论》《认同论》《融合论》4篇文章。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南宁的经验正是广西经验的一个缩影,一个地方性表达。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论断,深感这是对广西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史的精准概括和高度评价,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广西样本”的核心经验究竟是什么,广西在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民族事务治理、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又有哪些成功经验?

一般总结经验,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协调和沟通和谐入手。今天,我想另辟蹊径,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意境,来总结广西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广西样本”的核心经验和成功经验。主要有六大经验:

(一)阳光经验:党的阳光照亮广西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像“阳光”一样,既照亮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前进的道路,又给予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永续发展的能量。

(二)榕树经验:广西各民族千枝同根,血脉相通。

广西各民族如同榕树一样千枝同根、同气连枝,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历史命运共同体,在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生共荣。

(三)葵花经验:广西各民族亲如一家。广西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态势就如葵花一样,各民族一家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同德将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新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广西力量。

(四)石榴经验:广西各民族紧密相嵌,深度交融。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阶段,广西各个民族都如同石榴籽一般,紧紧相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为命。

(五)大象经验:广西民族工作是一个整体。

广西把民族工作当作一个整体,不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是各方协同,共谋发展。

(六)磐石经验: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安如磐石。

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安如磐石,正如《荀子·富国》所言:“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广西坚持依法治理精准施策,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为此,以重大涉稳问题化解专项工作,有效地防范化解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风险隐患,确保了民族团结进步安如磐石。

这六个意境,汇集在一起,形象地、完整地呈现了广西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核心经验和成功经验。

四、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样本”的世界意义

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下,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样本”的世界意义,以及对世界解决民族问题的启示很值得思考。

广西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有23万多平方公里,5000多万人口,有12个世居民族,所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广西样本”具有代表性,其世界意义在于为民族的共生、共居、共荣,提供了一个和谐发展的成功样本。

西方社会治理民族问题,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普京批评多元文化主义说:“多元文化论要求,在承认不同文化差异的同时,承认文化权利平等。这就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这种政治意味在于,它剑指政治

权力中心,要求政府权力部门和社会各机构对不同文化群体在政治上予以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西方国家是灾难性的。

“广西样本”告诉了世界:在全球治理中,民族团结进步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希望,就是胜利。全球一家,结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团结进步友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的生动体现,是世界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一个民族不团结,可能是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团结,可能分崩离析。正所谓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一块块砖只有堆砌在一起,才能盖起万丈高楼;一滴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存。这就是团结,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因此,民族团结进步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追求,它对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使命,就是要把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只有世界各民族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人类才能继续焕发出磅礴的力量,百年大变局才会为人类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五、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区域范本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积极意义

东盟国家社会制度和我们国家不一样,他们遇到的民族治理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多有“一体多元”的问题,如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不少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大多奉行类似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种族政策”。

广西与东盟山水相连,遵循“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广西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这样,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区域范本,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有榜样的意义。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所带来的和谐繁荣,无形中给东盟各国树立了榜样。

二是有互助的意义。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所形成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了与东盟各国互助的力量。

三是有桥梁的意义。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所构成的坚实桥墩,架起了中国与东盟,乃至世界联系的桥梁。

四是有合作的意义。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铸成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总之,立足“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区域范本,对中国-东盟合作,一定会产生更大更积极的影响。

【作者简介】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创建人;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院长;广西文史馆研究馆员。

主要著作有《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汉民族发展史》《中国民族史新编》等近30余部。

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民族学中排名第9。

2021年被上海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终身成就奖”。